

星海

大家小说

回归孔子的重要意义

夏海

孙奇逢是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誉为“清初三大家”之一。他为了统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提出了著名的回归孔子论点，“孔圣人万世之师，道之宗也。学者立必为圣人之志，只折衷于孔子足矣”（《日谱·录存》）；“学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正矣”（《理学宗传·序》）。回归孔子，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回归孔子，在明清之际的主要意义在于调和弥合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关系，安抚平息儒家内部的纷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是儒学和传统文化发展的两座高峰，推动了传统儒学的递进更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演变进步。程朱理学主张理于物，倡导格物致知，因类旁通的为学方法，注重居敬穷理、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陆王心学主张理于心，坚持知行合一，提倡自心自性的“致良知”。由于程朱理学偏于道问学，致使其后学术流弊了实病，沉溺于故纸堆中，流变于支离烦琐，拘谨保守，缺乏创新精神；陆王心学偏于尊德性，其后学术流生了虚病，活活有余而严谨不足，混淆儒学与佛学的本质区别，造成脱离社会的空疏流弊，严重的就是明末士大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孙奇逢认为，不是程朱和陆王犯了病，而是其后学术流弊了病。治疗实病要用泻药，虚病则用补药，“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歿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先生集·年谱》）。

统合理学与心学的基本方法是回归孔子。在孙奇逢看来，孔子是儒学创始人，其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历史上的诸儒之说皆是深造自得，从不同角度解读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各有各的长处，有的作用大一些，如“大德之敦化”；有的作用小一些，似“小德之川流”。但是，诸儒之说都不违背孔子的原意，都对儒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自浑朴散而象数之繁，异同之见，理气之分，种种互起争长，然皆不谬于圣人，所谓小德之川流也。有统宗会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贯之，所谓大德之敦化也”（《夏峰先生集·卷十三》）。孙奇逢对于孔子与诸儒的关系有一个形象比喻，“孔子之备四时之令焉，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其二十四气耶，再次之，其七十二候矣。合之始成此岁功也”（《理学宗传·义列》）。孙奇逢不仅在此基础上统合理学与心学，而且在具体观点上也进行了统合。对于格物致知，理学重在格物，心学强调致良知，这是理学与心学的最大分歧。孙奇逢促进格物与致良知互相结合，认为“且一理豁然，则物即是知，物物皆知，水月交融，光光相射，不复辨别格之物与致矣，此亦知与物不相离也”（《四书近指》）。对于顿悟与渐修，理学重渐修，心学主顿悟。孙奇逢则指出顿从渐来，无渐何顿，“渐者下学，顿者上达也，不可以分言，则顿之非虚而渐之非实，不当作歧观”（《夏峰先生集·寄张逢轩》）。对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理学重问学，心学主德性。孙奇逢用博与约的辩证关系加以论证，“究而言之，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不离道问学也”（《理学宗传·陆子文安》）。回归孔子，是理学与心学都能接受的基本立场，孙奇逢的贡献在于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和不同侧面消融在一个更大逻辑前提之下，安放在同一命题结构中的不同位置，进而在功能上赋予其同一意义。

回归孔子，不仅能够有效统合理学与心学的关系，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思想学术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这就是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伦理方法，也是对待不同思想学术观点的正确方法。孙奇逢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辩证地看待思想学术的异与同，认为“凡异而同者，道之全者。异为真同，同为真异。见异于同，乃可辨道；见同于异，乃

为见道”（《四书近指》）。在孙奇逢看来，对待思想学术的异同，态度很重要，不能有偏见和执心，“学问之事，最怕有偏见，尤忌有胜心。偏见与执心相近，然一偏则愈执而愈成拗矣。胜心与自任相近，然一胜则愈任而愈背矣”（《夏峰先生集·寄崔蔚林》）。也不能带有色眼镜，以人划界限，论异同，“人生第一吃紧处，只不可见人有所不是。一见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则亲疏远近以及童仆鸡犬到处可憎，终日落坑阱中矣”（《夏峰先生集·孝友堂家训》）。正确的态度是平心而论，谨慎探讨，“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夏峰先生集·年谱》）。

孙奇逢从道的角度探讨儒家学术之间的异同，“道原于天，故圣学在天，在天者愈异而愈同”。儒学内部之所以有不同看法，是因为对道的体贴不同，“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是无时无处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执中是尧舜自己体贴出来，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自己体贴出来，主静无欲是周子自己体贴出来，良知是阳明自己体贴出来。有此体贴，便是其创获，便是其闻道”（《夏峰先生集·卷四》）。在儒家内部，无论有多少种体贴和不同认识，都是同大于异，异归于同，“同而异者，一本散万殊也；异而同者，万殊归一本也”（《夏峰先生集·卷五》）。孙奇逢的胸怀宽广之处，不仅在于正确对待儒家内部的异同，而且在于能够正确对待儒释道之间的异同，认为圣道恢宏广大，既能容纳儒家各派的思想，亦可接受释道思想为我所用，“儒与禅有不得不同者，儒不能避也，禅与儒有不得不异者，禅不能强同也”（《日谱·录存》）。孙奇逢还提出了“以异证同”的具体方法，认为学者不可“专执一偏之见，正宜于古人议论不同处，着眼理会。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陆不同，岂可相非？正借此有异以证其同”（《夏峰先生集·卷十三》）。为了更好地说明以异证同的方法，孙奇逢以“适邦畿”为例，说明到达邦畿有着不同的路径，既有山路又有水路，既有水路又有陆路，不同路径见到的风光是不一样的，行者不能以山路风光否定水路风光，也不能以水路风光否定陆路风光，“如适邦畿，从山从水从陆，途各不同，期归于邦畿而已矣。从山者所见皆山，从水者所见皆水，从陆者鸟得而非之？及抵邦畿，则同一邦畿之见已矣”（《夏峰先生集·卷九》）。历史表明，思想学术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存在，是思想学术进步的标志和动力。孙奇逢倡导“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至今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学术价值。

回归孔子，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追根溯源、正本清源，进一步弘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了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孔家店不等于孔子，孔家店是历代封建王朝建构的，自然是糟粕居多，应予基本否定。而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创立的儒家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品格，因而有学者明确提出既要“打倒孔家店”，又要“救出孔夫子”。当前国学和传统文化受到普遍欢迎，人们热切期盼传承国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文明再创辉煌。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救出孔夫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际行动。回归孔子必须回归经典。孙奇逢认为，《论语》集中概括了孔子之道和圣人之道，“《论语》中论学是希贤希圣之事，论学是为己立身之事，论仁是尽心知性之事，论政是致君泽民之事，论言行是与世酬酢之事，论富贵贫贱是境缘顺逆之事，论交友是亲师取友之事，论生死是生顺死宁之事。只此数卷《论语》，无义不备，千圣真传，不能出其范围”（《夏峰先生集·卷一》）。因此，当前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热，要回归孔子，从经典那里寻找思想的真谛、智慧的源泉和文化的根脉。

怎样回归孔子呢？孙奇逢的思想仍然值得重视和借鉴，首先是识得天理。天理属于本体范畴，“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理学宗传·序》）；“识得天理二字，是千圣真传，非语言文字可以承当”（《汤子遗书·卷七》）。孙奇逢的天理不是程朱理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孟子思想的延续发展，“尽其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尽心就是知性，知性就是知天；存心就是养性，养性就是事天，从而把心、性、天联系在一起。孙奇逢则合天、命、心、性、理为一体，“心、性、天、命四者只一样，人具之之心，心之灵为性，性出自于天，天之一定为命”（《四书近指》）。天、命、心、性的出发点是人性善，“天——命也，命——性也，性——善也。达而在上与穷而在下，同一命也性也，则同一善也”（《夏峰先生集·答魏石书》）。而落脚点则是儒家推崇的修身养性，“知天，是知自心之心；事天，是事自心之天；立命，是立自心之命。总之，心生天，生命也”（《四书近指》）。同时，要躬行实践。实践属于认识论范畴，“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夏峰先生集·复梁以道》）。孙奇逢认为，天理虽然内在于人心中，却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认识内在于心的客观事物。实践不是高不可攀的活动，而是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为学应于日常生活中去明体达用，“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夏峰先生集·卷十三》）。实践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是眼前之事，为学应于眼前之事中去躬行天理，“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静对之我，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不知道也者”（《夏峰先生集·卷一》）。实践不是空言心性，而是脚踏实地的明心见性，为学应于脚踏实地中去识得吾心之良知，致得事物之道理，“若分何时于下学，何时为上达，何处为卑近，何处为高远，便于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色亦无性，糟粕亦神奇。说心，本事上见；说体，在用上见；约理，在博文上见；致知，在格物上见。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原无许多头绪”（《夏峰先生集·卷二》）。

孙奇逢歌咏：“说什么程朱陆王，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夏峰先生集·年谱》）躬行实践，是回归孔子之正途。在躬行实践中，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再创中华文明辉煌。

今年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前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稍早首都博物馆、北京马连良研究会等单位主办了“龙马精神海鹤姿——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北京京剧院推出“纪念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展演”，并召开马派艺术研讨会，意义非凡。相信值此良机，马派艺术会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马派艺术是中国京剧艺术一笔丰厚的遗产和活态艺术，从理论上总结马派艺术是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老一辈学者、艺术家有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可惜在现有的重要选题中，比如国家课题、博士论文选题，较少涉及马派艺术。

梅兰芳纪念馆收藏有梅兰芳及京剧艺术大量文献，这些文献虽历经“文革”依然得到完好保存，它是我们研究梅兰芳和京剧艺术非常重要的宝藏。这其中也包括马连良先生的文献资料。据初步统计，馆藏马连良先生照片17张、戏单107张、信件2封。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大，而且时间跨度也较广。一幅编号为戊01072的“梅兰芳与须生演《四郎探母》舞台照”，剧中梅兰芳饰铁镜公主，马连良饰杨延辉，从其守旧上有“睨华博士”等字样可以看出，这是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获得“梅博士”称号后之演出，也是马连良与梅兰芳合作的珍贵影像资料。

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天津与杨小楼、尚小云、马连良、小翠花、李万春等20余人义演后合影，抗战前在上海梅兰芳与马连良、尚小云等及中外人士70余人合影等，都非常珍贵。也有20世纪50年代《汾河湾》剧照，梅兰芳饰柳迎春、马连良饰薛仁贵。1953年10月20日，梅兰芳与马连良等参加由贺龙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屆赴朝慰问团到团赴朝鲜，进行为期近40天的慰问演出。馆藏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马连良与志愿军官兵等13人在朝鲜照，梅兰芳、马连良赴朝鲜归来后在北京与戏曲界赴朝归来同志合影集照，内有周信芳、程砚秋、许姬传、梅葆玖等40余人。馆藏梅兰芳、马连良最后的合影，应该是梅兰芳在北京收受李国粹拜师时与夫人福芝芳等26人合影，内有夏衍、齐燕铭、田汉、徐兰沅、姜妙香、姚玉芙、李慧芳、梅葆明、梅葆玖、刘连荣、马连良、许姬传、马彦祥，时间为1961年5月6日，距梅兰芳去世仅3个月的时间。梅兰芳追悼会后送葬宾客在墓地祭奠，有齐燕铭、马连良、俞振飞、尚小云、荀慧生等数百人合影。

馆藏马连良戏单较多，共计107张，亦大多为梅兰芳与马连良同台演出之戏单，时间跨度从1918年至1961年5月。1918年2月15日（戊午年正月初五日）在江西会馆朱宅堂会，梅兰芳与姜妙香、姚玉芙等合演《千金一笑》，尚小云、高庆奎、马连良《四郎探母》等共22出剧目。编号丁01136戏单，1961年5月18日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举行“京剧传统节目第四次内部观摩演出”，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市京剧团演出。有马连良《铁莲花》，李多奎《赤桑镇》《玉玲珑》，共3出。其中有不少早年的堂会演出，如编号丁10086戏单，在江西会馆朱宅堂会演出，为1920年12月1日（庚申年十月二十二日）早九时开演，大轴杨小楼与钱金福合演《状元印》，压轴梅兰芳与姚玉芙合演《金雀记》、梅兰芳《宇宙锋》、梅兰芳《女起解》、马连良《三岔口》等共31出。编号丁10105戏单，朱宅寿春堂会，时间为1919年8月8日，大轴《金山寺》，压轴梅兰芳与陈德霖、姜妙香等合演《凤箫怨》，马连良《三教寺》等共27出剧目。编号丁10108戏单，为袁宅堂会，时间为1919年8月4日（旧历七月初九日），梅兰芳演《嫦娥奔月》、马连良《一捧雪》等共25出剧目。编号丁10133戏单，1918年9月16日（民国七年农旧八月十二日）李宅堂会，梅兰芳与余叔岩合演《戏凤》、马连良《胭脂泪》等共24出剧目。编号丁10191戏单，为1923年杨宅堂会，杨小楼与郝寿臣合演《连环套》、马连良《甘露寺》等共16出剧目。

演出年份最多的戏单是1934年9月、10月间上海荣记大舞台，共计46张戏单（有重复），这期间9月9日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金少山、叶盛兰演出全本《龙凤呈祥》，10月14日梅兰芳、马连良、高雪樵、萧长华、程继先、茹富蕙、金少山演出全本《抗金兵》。这应该也是梅兰芳与马连良搭档较长时间的一次演出，前后达40多日，同台同剧有30多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也是马连良与梅兰芳合作的又一重要时期。除类似与1952年6月21日庆祝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开幕京剧晚会，梅兰芳与马连良、谭富英合演《甘露寺》；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持京剧晚会，梅兰芳与马连良、谭富英在政务院礼堂合演《甘露寺》。编号丁20627戏单，1957年8月9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二届代表会

梅兰芳纪念馆藏马连良文献及价值

刘 祯



梅兰芳纪念馆藏梅兰芳、马连良戏单

议举办，马连良是回族。在京回民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晚会节目单上，马连良、侯喜瑞演出《四进士》。编号丁20606戏单，1959年7月9日，北京市京剧评剧曲杂工作者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戏曲界第三批折剧目展览”，在北京音乐堂演出，其演出说明马连良、袁世海、叶盛兰合演《借赵女》。当然这些戏单都与梅兰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梅兰芳去世后马连良的戏单及文献就几乎没有了。

在这些文献中，其中马连良20世纪50年代致梅兰芳的两封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分类号甲00521信写于1951年：

晚华仁兄惠鉴：前闻吾兄在汉上演盛况空前，曷胜欣慰，并闻贵体曾感不适，想返申后定必康复为颂。前者陈肃亮先生来港带来口信，诸承关念，并盼早日返归，足证爱护之深，无任感谢。弟旅港尚将三载，屢思作归，辄以俗务羁身，加以顽躯时感痛病，迁延至今。最近由汉口人民剧院约往，现已决定赴汉，约秋节前后演出。弟回来以后，一切尚仗吾兄鼎力照顾，随时赐教，是所盼祷。把晤不遑，余言面叙。即颂夏安 嫂夫人祇代问好 弟 马连良拜启 七月廿五日

马连良写这封信时人在香港，住于香港铜锣湾摩顿台三号楼。他是1948年到香港，1951年10月1日回到大陆（苇窗《一本未完成的年谱》，香港《大成》月刊第37期）此信即写于回大陆前，可以看到马连良此时的思想和决定。信中所谓“前闻吾兄在汉上演盛况空前，曷胜欣慰，并闻贵体曾感不适，想返申后定必康复为颂”，指梅兰芳该年4月16日率梅兰芳剧团南下汉口演出，其时中国戏曲研究院刚刚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梅兰芳到武汉后，传达了毛泽东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听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汉京剧演出的盛况，看了中国京剧工作团的演出剧目和阵容。此次到武汉梅兰芳剧团演出近2月，与高盛麟等重排了《抗金兵》，6月19日结束武汉的演出，回到上海。在上海参加文艺界为朝鲜战争发起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活动，演出全部《龙凤呈祥》，将京剧界捐献义演活动推向高潮。这一年间，梅兰芳全家从上海搬回北京，定居护国寺街甲1号（现护国寺街9号），所以马连良寄给梅兰芳的地址是上海马斯南路89号。

信中可以看见到，马连良的“早日返归”，是与梅兰芳出面，请陈肃亮赴港带给马连良口信，所谓“诸承关念，并盼早日返归”，有重要关系。这一“关念”与马连良“屢思作归”是一致的，所以有马连良接下来“赴汉，约秋节前后演出”的决定，并表达了“弟回来以后，一切尚仗吾兄鼎力照顾，随时赐教，是所盼祷”，这可以看出马、梅关系密切及马连良对梅兰芳的信任。这是马连良人生的一个关键选择，而梅兰芳发挥了重要作用，才有马连良回到新中国的选择。当然，马连良最后的悲剧是谁都想不到，而那时梅兰芳已先逝。

另一封信件分类号甲00527，于1957年5月5日写于长沙：

晚华大哥：您好！您去年在各地演毕回京后，我们又赴长沙等地演出。在京时进行整团，诸事



繁杂，经常开会，外出时由于合团的影响，种种活动多起来了，就没经常给您写信，请您原谅吧！

日前接到啸伯同志来信，谈到您对会上的支持和演出时的热诚，这是您一贯的精神，可见对同业的关怀了。听说冯六爷到京了，身体定很健强，请代为问候。

我们在长沙演出情况很好，五日期满，即赴上海。十四日演出情况如何，再给您去信。长沙气候不佳，仍穿棉衣。北京流行病虽见好转，您也要多加保重身体为要，并望时赐函示。 专此 叩祝 顺遂！ 弟 马连良敬启（章） 问嫂夫人安好！慧莲附笔问候！ 五、五姐妹问好！玉芙同志等问好！ 君秋问候 阖府均安！

该信发于“长沙市中山东路交际处”，用的是北京京剧团信封，所寄地址为“北京西四区护国寺东口壹号”。与前封信相比，首先马连良对梅兰芳称谓发生变化，此前是“睨华仁兄”，到1957年变为“晚华大哥”，称谓的这种变化，可以看出马连良返京后两人关系的进一步走近。马连芳1956年率中国京剧团访日演出后，去南方杭州、南京、南昌、长沙及武汉有长达4个多月的演出，这也是马连良信中“您去年在各地演毕回京后，我们又赴长沙等地演出”内容。马连良提到的“整团”，指1950年代剧团的改制，1952年8月马连良自组马连良剧团，主要成员有杨荣环、周和桐、黄元庆、马富禄等；1955年11月，该团与谭富英、裘盛戎为主的北京市京剧二团合并，组成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1957年1月，以张君秋为主的北京市京剧三团并入北京京剧团，为二次合团。这一时期的“整团”奠定今日北京京剧院的基础，对当代北京京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啸伯”指“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1935年梅兰芳邀请进入承华社合作演出，1957年错划为右派。“冯六爷”指梅兰芳好友冯幼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银行公私合营后的私股董事，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沙演出后，马连良与北京京剧团赴上海演出。

这封信马连良人在长沙给梅兰芳介绍其演出、当地气候等情况，也透露出1957年那个特殊年代北京“戏改”情况和面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从马连良的信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与梅兰芳非同一般的信任和友谊。

就马连良一生的艺术及思想来看，梅兰芳纪念馆馆藏文献，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鉴于马连良与梅兰芳之地位与关系，这些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就尤为重要。马连良与马派艺术研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关文献的挖掘、收集、整理、分析和研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文献与图片由梅兰芳纪念馆提供）